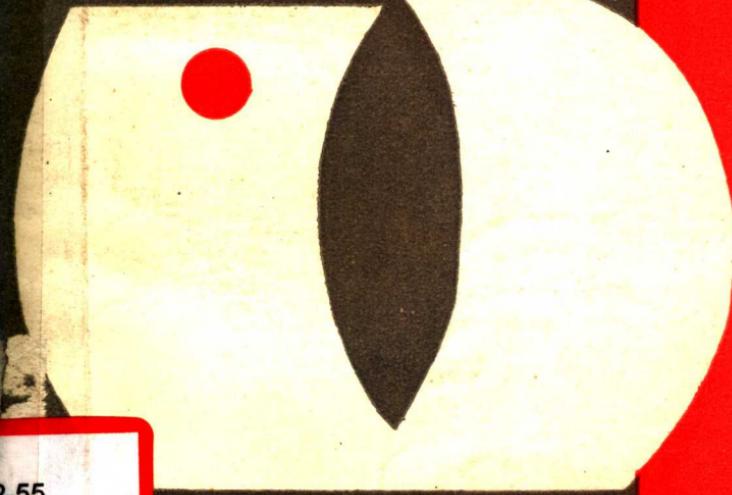


詩探索



hi
tansuo

2

1982

2-55

(2)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诗探索》编辑委员会

主 编	谢 罅			
副主编	丁 力	杨匡汉		
编 委	丁 力	公 木	公 刘	尹一之
	易 征	孙绍振	宋 全	杨匡汉
	闻 山	张 炯	唐 祈	袁可嘉
	晓 雪	雁 翼	谢 罅	

诗 探 索

1982年第2期(总第7期)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 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173千字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400册

统一书号：10190·124 定价：0.70元

目 录

1982年第2期（总第7期）

人间要好诗

- 对当前新诗一些问题的看法 邵燕祥 (1)
中国新诗的繁荣与精神文明的建设
..... (白族) 晓 雪 (35)

• 新 探 索 •

- 读罗中立的油画《父亲》
..... 公刘创作 王光明评点 (42)
回答一个不知道名字也不曾见面的少年
..... 冀汸创作 黄子平评点 (47)
给女雕塑家张得蒂
..... 艾青创作 陶文鹏、孙厚感评点 (52)

• 新诗发展问题探讨 •

- 略论诗人“自我”的发展 叶 楷 (56)
工业诗的突破 舒 平 (67)
诗，升起了新的美
——评近年来诗歌艺术中出现的一些新手法
..... 徐敬亚 (74)

- 关于诗的艺术美 墨 明 (92)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思考 陈良运 (97)

· 诗 人 研 究 ·

勇开先河

- 试谈李季石油诗的创新问题 雷业洪 (112)
朱湘散论 钱光培 (119)

写自己和人民相通的那一点

- 诗坛新秀叶延滨和他的诗 朱先树 (127)

· 诗 艺 谈 ·

中国古典抒情诗的自然意象

- 中国古代诗歌分类研究之一 肖 驰 (134)
中国诗中的时、空、我 (节选) 刘若愚 (150)
诗人的相对感 俞兆平 (161)
论想象的形式 耿占春 (164)

· 诗 窗 ·

- 诗论两篇 (波) 密茨凯维支著 林鸿亮译 (176)
《中国新诗导论》(国外书刊译介) 陈圣生 (187)
中国新诗在国外 然 理 (195)

- 台湾白话诗的崛起 汪景寿 (199)

· 诗 通 讯 ·

- 关于诗艺的通信 罗 洛 刘湛秋 (206)
致邵燕祥 高 平 (211)

· 补 白 ·

- 诗的杂议 孟 河 (194)
诗人谈诗 福春辑 (41)

封面设计

曹辛之

人 间 要 好 诗

——对当前新诗一些问题的看法

邵 燕 祥

就诗的一些情况和问题，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没有系统的研究，只能叫杂感，叫漫谈。感想式的东西，没有上升到理论。

但我希望谈出来和同志们交换意见。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在尊重别人的劳动和尊重别人的民主权利的条件下谈问题，讨论，以至争辩。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百家争鸣，也就不会有真正的百花齐放。

我们要尊重别人的劳动：别人的创作和理论，别人的实践，不论是成功的或失败的经验，只要是严肃的劳动，而不是哗众取宠的把戏、买空卖空的吹牛，就值得尊重，应该尊重。

我们要尊重别人的民主权利：“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尊重你的发言权”，即使总体是错误的意见，也不排除个别的论点、论据有可以吸取的合理的内核。

在思想问题上，学术问题上，我们应该取这种态度。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只有这样做，才能最终对人民的事业有利，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利。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我们的共同语言。你不同意这个方向，我们就没有共同语言。

我们是谈诗，谈诗的创作，诗的评论，诗的探索与创新，这

也是我们的共同语言。你的兴趣不在诗，你只是要借诗作名利的敲门砖，作拉山头的、夺权的门径，那我们也就没有共同语言了。罗丹《艺术论》开头的《遗嘱》中告诫说：

“你们不要浪费时间，在交际场中或政治圈里去拉关系。你们会看到许多同行，勾心斗角，谋求富贵——这些不是真正的艺术家；可是其中不乏聪明的人。如果在他们的地盘上打算和他们争名逐利，你们将和他们同样浪费时间，就是说耗尽你们的一生——那就再不剩一分钟的时间给你们去做一个艺术家了。”

罗丹在这里说的那种不是踏踏实实进行创作，而专靠拉关系争名逐利的人，也就象今天被讥为“功夫在诗外”的人一样，恐怕不在文艺研究之列，我们也很难同这样的人来严肃地谈诗，严肃地谈论如何使诗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我学习得很不够，但我想我们应该力求用马克思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我们面对的情况和问题。我们要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划清界限。当然，我们也不要冒充马克思主义的，例如日丹诺夫那一套当作马克思主义了。

（一）关于新时期诗的主流

主流是发愤和奋发的诗。

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个诗的潮头，也可以说是文艺的第一个潮头，实际上是天安门诗歌的继续：揭发“四人帮”，歌颂老革命。

揭发“四人帮”，起了控诉会、耻辱柱的作用。

同时，歌颂了周恩来总理和其他老一代革命者。

总地来说，真诚代替了虚假。

但在欢呼粉碎“四人帮”的赞歌中，有呼应新的个人崇拜的回声；在欢呼向“四化”进军声中，有新的虚夸的影响。

接着，两年徘徊中的压抑，在三中全会前夕迸发出来：

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歌颂四五运动及其英雄人物；

反对两个“凡是”，从现代迷信中解放出来，围绕张志新的众多诗作是其突出表现；

还有一个主题，从写十年内乱的创伤，进而回溯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

与此同时，突破了题材的禁区，体裁的禁区。

有了讽刺诗，有了寓言诗；

有了与过去流行的政治抒情诗风格不同的政治诗（如反对血统论的诗）；

有了爱情诗。

也有了感情和感情表达方式的多样化（有呐喊，也有呻吟，甚至有怅惘与痛苦）；

有了形式、风格的多样化（自由诗，无韵诗的重新出现）。

一九七九年诗歌达到又一个高潮。

突出表现为恢复和发展了诗歌的现实主义，强调写真实，写真情实感，反映人民的生活、斗争、愿望和爱憎。

一方面，张学梦、骆耕野等通过诗人自我的独特感受，反映了人民对四化、对改革、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渴望与追求；

一方面，从一般地抨击时弊到理直气壮地捍卫革命传统。

新时期中诗歌的发展阶段，是以政治形势的发展为分野的。这并不奇怪。

正是粉碎“四人帮”的枷锁，使我国重新有了诗歌，以三中

全会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使诗真正在人民中复活。

四年多来，阴谋文艺被摒弃了，标语口号式的诗基本杜绝，败坏了读者的胃口、也败坏了诗的声誉的“假大空”的诗歌逐步销声匿迹（虽然还没有消亡）；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受到读者的抵制。

这表明，诗在思想上、艺术上有了长足的发展，诗歌中的现实主义主流战胜了虚伪的、矫饰的、歪曲现实的，亦即反现实主义的诗歌。

文盲国家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的建成有赖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翼的相辅相成。

社会主义新时期诗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它受到了不怀偏见的人们的重视和爱护。

（二）关于百花齐放

从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特别是从三中全会以来，文艺领域逐步实行百花齐放的方针，究竟是放出了一片春光，还是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

对整个新时期的文艺，包括诗歌，要充分肯定成绩。

成绩来自思想解放运动，来自“双百”方针。

“双百”方针的实行，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巩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近两年来“双百”方针的实行所受的干扰和抵制，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对于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干扰和抵制。

我们的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要求我们的诗

歌，归根结底，要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

我们接受历史上的经验，不要陷入对这个问题的狭隘的理解甚至曲解。

我们的诗写政治，写政治生活，政治感情，也写政治以外的题材。题材的多样性是有利而不仅是不利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诗和一切文艺作品一样，具有教育意义、认识意义和审美意义。

但诗毕竟首先是诗。

画上的猫不是为了捕鼠的。黄永玉的猫头鹰也不是为捕鼠的，它要起比捕鼠更大的作用。

我们不是“文艺救国论”者，不是“诗歌救国论”者。我们的诗歌和文艺，要通过文艺的特点来起作用。诗歌，哪怕是尖锐地抨击时弊的，也只能帮助而不能代替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

诗歌主要是陶冶人的感情，经过潜移默化，对读者进行鼓舞、启发和教育。它起作用的对象和范围是人的灵魂，人的精神世界。

在文艺作品中，教育、认识、审美三个意义是不可分的。社会经验，人生阅历，感情的风雨……帮助人认识生活，就是一种教育。由于它是具体的，形象化的，也就是审美对象。而审美感的培养提高，即美育，不也正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吗？

文艺具有思想和道德力量。

诗的思想和道德力量，是通过感情的律动实现的。

评价诗的思想、道德力量，评价诗的社会功利，我们使用的进步、革命这些概念，都属于政治范畴。

与此同时，还要评价诗的艺术价值、美学价值。

这种评价，当然要在“诗”而不是“非诗”的前提下进行。

首先要是诗，是真情实感，然后看这个真情实感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意义，是不是健康的。

我们坚持革命功利主义。我们生活在充满矛盾和斗争的社会当中，诗不可能是象牙之塔里的东西。

健康：是个比“政治上正确”更宽广的思想政治标准。

健康，意味着新生、发展、向上、进步、积极。

健康，即包括内容（不限于政治内容），也包括艺术趣味，艺术境界，艺术格调。

健康的文学，是积极的，乐观的，入世的，具有人民性、进步性的文学。

健康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有利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道德、情操，包括关心人、关心集体、关心政治的精神境界。

健康，可以把社会学的、美学的标准统一起来，就是要有利于人民的团结进步，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建设。

当然，也要防止把“健康”化为一条棍子，动辄斥人为“不健康”。

感情多样化，喜怒哀乐，都因思想基础不同，而可能有健康或不健康的表现。要作具体分析。绝不是写悲哀就不健康，写痛苦就是病态。

我们的“健康”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对“人”，对“人性”的评价。

是建设的，还是破坏的？

是健康的，还是颓废的？

我们要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不要僵化、保守、停滞、倒

退。

我们要人民的团结，精神文明的提高，不要离心离德，消沉绝望，尔虞我诈，自私自利。

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在它的曙光期还是进取的，向上的。我们为人民、为社会主义而立言的诗歌，更应该是推动人民群众团结奋斗，“改造自己的环境”的。

要使“百花齐放”的局面真正实现，长期发展下去，就要克服历史上那种“你死我活”“斗、斗、斗”的左的指导思想在人民内部（包括作者和读者，包括诚心诚意要求“百花齐放”的作者和读者的头脑中）的残余影响。

不是你一家独霸，就是我一家独霸，不管我放的是花不是花，是真花还是假花：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还哪里有“百花齐放”呢？

一花独放不好。

九十九花齐放也不是百花齐放。

一百种花，而且彼此不能取代。这才是百花齐放的局面。

（三）关于创新

诗是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诗。

诗要创新，不断创新才能发展。

时代发展了，生活前进了，诗的服务对象、工作对象都有变化，今天的读者已经不同于昨天的读者。诗从内容到形式都要适应新的情况。

在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老一套；诗难道能老一套？

有心的诗人进行追求、探索、试验。

青年诗人有追求，有探索，有试验。

老年、中年诗人也有追求，有探索，有试验。

从内容到形式，从题材到风格、手法，进行多方面的开拓和创新。

刚刚开始。不是过头了，而是很不够。

一切严肃的创新的努力，不论成败，不论成果大小，都应当受到鼓励。

胡适把他的诗集命名为《尝试集》，我们难道不应当比胡适更有气魄，更敢于尝试吗？

艺术上的创新，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反复，不断在成功和失败之间渗透、吸收、补充的过程；要谨慎地鉴定，恰如其分地估计，而不轻易作失败的结论。

但既是创新的试验，就允许失败，允许走弯路。

要支持有志于创新者既热情又保持清醒冷静。特别是对青年的新人，要帮助他们解决创新的方向，解决创新与继承、借鉴的关系。

创新，是严肃的劳动。

要有理论的指引，要有对历史道路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

绝对地需要的是踏实的劳动，而不要起哄，不是赶时髦、摸行情，“功夫在诗外”的一哄而起。

“如果只是口号论争，没有结实的作品产生，那就没有什么意义。”（鲁迅语，据吴奚如回忆）

• • •

艺术上的追求、探索、试验，出发点在哪里？

艺术上的创新是为了什么？

不是为艺术而艺术。

也不是为创新而创新。

诗的创新，是为了更充分地、更有力地反映时代，反映人民生活，更充分地、更有力地表达诗人的真情实感，是为了使诗更好地满足新时期人民对诗的需要，更有利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诗本身来说，也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现实主义的、人民性的传统。

作诗的创新者，不只是如一般所说的，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且首先要熟悉和热爱新生活，作一个实在意义的新新人。

思想上是旧的，落后于时代的，在艺术上创新，是不可能的吗？

诗是精神世界的产物，又作用于精神世界。

精神上属于旧世界、旧时代（旧的历史时期）的诗人，肯定写不出新时期人民群众所要求的，创新的诗。

精神上脱离人民的诗人，他们的诗绝不可能成为开启人民心灵的钥匙，通向人民心灵的桥梁。

鲁迅在《门外文谈》（《且介亭杂文》）中有一段讲改革者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的话，很可供诗人们参考。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有权，却不是骗人，他领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诗的创新是相对于现状和历史而言的。

新诗有六十年（两个三十年）的历史。

创新要在六十年新诗的基础上进行，要接受新诗六十年来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因此不能不考察和总结新诗的历史经验。

但又不能等待历史经验作出全面科学的总结之后再来创新，犹如不能等待诗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全面树立之后再进行创作一样。

首先是以后三十年的经验为鉴，肯定成绩，确认不足，然后创新，前进。

其次必然上溯前三十年的经验，如何在新条件下发展成功的经验，同时避免各个流派所曾有过的失误。

总结历史经验，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考虑，不能脱离历史条件苛求于前人。

后三十年，特别是十七年，诗同整个文艺一样，是有很大成绩的，而其间的主要问题是不够“百花齐放”。

这就是为什么要在五十年代中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缘故。这是政治上民主化的需要，也是繁荣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包括诗歌）的需要。

后来，“双百”方针没有真正贯彻。

从存在问题这方面来说，十七年的诗，现实主义不够，浪漫主义也不够。

现实主义不够，由相当数量的反现实主义的，以假话、大话、空话为标志的诗歌的出现所证明。而且，机械地刻板地写实，也并不就是现实主义，更谈不到现实主义深化（或深化了的

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也不够，伪浪漫主义亦即反现实主义的东西冒充过浪漫主义。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图解“共产主义理想”也算不上真正的浪漫主义；何况当时有些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不相干的。

如果说“百花齐放”意味着多样化，那末十七年的诗，正是在题材、形式、风格上远远不够多样化；没有反映多样化的生活的多样化的本质表现，没有表现出多样化的抒情个性，多样化的感情状态。

诗的灵魂是感情。总地看来，那时诗中表现感情是比较单一的。如同“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一样，成文或不成文的看法认为一个阶级只有一种“典型的”感情，一种感情又似乎只有一种“典型的”表现形式。

感情的单一和简单化，不能不成为批评的框子。五十年代对何其芳《回答》、艾青《双尖山》、郭小川《望星空》的批评，就是突出的例子。

没有内容和形式、思想和幻想的广阔天地，诗人独特的东西（自己的发现，自己的想象，自己的表达方式）常常被视为异己。

想象少于写实。

赋多于比兴。

象征，寄托，因为容易发生歧义而逐渐绝迹。在《草木篇》招致灭顶之灾以后，除了“太阳”“东风”这样一些比兴之外，诗人不敢轻易涉足其他。而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也是只有朝阳，落日成了禁忌。这还怎么能有抒情诗呢？

* * * * *

诗的创新，不能离开时代和人民这个大地，也不能离开三十

年以至六十年新诗的已有成就的土壤。

诗的创新，还要解决纵的（对中外古典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横的（对外国现代诗歌的借鉴）两个关系问题。

对传统的最好的尊重，就是发展传统，就是青出于蓝。

对历代前辈诗人及其作品的尊重，不是背诵和模仿，而是学习他们如何不墨守陈规，跟随时代发展在诗中表现他们各自当代人民的生活和感情。抄袭与因袭的，都不是好学生。

我国古典诗歌在其两千年的历史中，不断地突破，不断地发展，不断地从人民的语言、民歌及其他民间口头文学吸取营养，不断地接受外来影响，不断地摒弃僵死了的内容和形式。

诗的总的发展趋势，倾向于自由。

公木同志指出向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学习，“重点不在格律形式方面，而在表现技巧方面”，这是很有见地的。

继承是为了发展。

向民歌和古典诗歌学习，必须立足于写“新诗”，甚至有必要强调指明为“白话诗”。因为用现代语言（现代口语，现代书面语）写诗，这是五四时期提倡“白话诗”的重要分水岭。可以吸收旧诗词中还有生命力的语汇，但一定要防止成为旧语言的俘虏，不要半文半白的“改造脚”。

语言是表现感情的工具，诗是语言艺术。

要把生活语言提炼为诗的语言。现代诗应是现代语言的典范。

有人提出诗要突破语法的一般规范，这在特殊情况下是可以允许的。但这只能是个别的变例。

* * *

诗的创新，要大胆地吸收外来影响，包括外国古典和现代诗歌的影响。

而且，不是消极地被动地接受影响，要主动地自觉地吸取营养。这就意味着必须消除盲目性。

只要有健全的胃消化和吸收，多种营养总胜于“吃偏食”。

吃牛羊肉，不会就变成牛羊的。当然，不要食洋不化，如同不要食古不化一样。

重要的是占有材料，把该学的东西学到手。不要犯鲁迅在《扁》一文中说到的笑话：

“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介绍这名词的涵义。

“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夹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

“还要由此生出议论来。这个主义好，那个主义坏……等等。”

在政治生活中，几十年来“曾经一再犯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外国经验神圣化的幼稚病”。

艺术上也要接受“全盘西化”论者的反面经验，力戒这一类教条主义，避免一知半解，囫囵吞枣，仅得皮毛，借以吓人。

现在，主要是克服长期闭关锁国状态所造成的狭窄眼界和保